

## “不带病上课上学”是教育的理性纠偏

□许朝军

教育部日前部署各地做好冬季流行性疾病防控工作,保障师生健康和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明确师生不带病上课上学,学校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可不作硬性要求。(12月6日《北京日报》)

教育部首次用“不带病上课上学”的明确态度,对患病师生的上课和上学等现象进行叫停。同时,“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可不作硬性要求”等细化规定,都充分体现了以师生身体健康为重的科学预防思维。教育部明确提出“不带病上课上学”,除了凸显对师生身体健康的呵护关爱之外,无疑更是对传染性疾病预防传播的科学干预。如果患病师生继续上课上学,恐怕更易加剧传染程度,不利于疾病防控和师生身体健康。因此,从科学预防疾病确保师生健康角度,这种干预无疑是科学理性和人性的结合到位。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不带病上课上学”其实更是教育的理性纠偏。现实中,不少儿童医疗机构经

常出现孩子一边输液一边读书做作业的现象,获得不少见证者的点赞。而教师挂着吊瓶上课等现象,也被人们津津乐道。据杭州公安近日发布的消息,浙江杭州一名11岁小男孩大哭报警。因为他生病两周住院一周,欠下了许多作业,妈妈让他两天补齐三周作业,于是小男孩崩溃报警了。这些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源于现实中很多人对带病上课上学和康复后集中完成作业是持理解肯定态度,甚至有些还成为获赠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现象和行为背后透露出的是让人感动的教师敬业奉献精神,以及学生宁可忍受病痛也要完成学业的顽强精神,而康复后集中完成作业也大多缘于学校的硬性学习任务规定以及不能落下功课的家长和学校、社会认知认同。

事实上,利用上课传道授业解惑完成育人任务,学生按照规定要求或者从发奋顽强角度克服疾病影响按时上课完成作业,除了看得见的精神能量进步意义之外,对教育

教学和个体成长发展的现实意义并不大。一方面,处于患病期间的师生,很容易因为传染等不良影响导致疾病蔓延,影响师生群体健康。另一方面,处于患病期间的师生,身体本身就处于虚弱状态,在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和课业任务方面,质量绝对与平时不可相比。每个人包括师生都不愿意生病,与其追求低质量的教学和上课学习,冒着加重疾病和影响健康的风险去“自虐式不耽误课业学业”,何不在人性干预的前提下,等身心恢复健康达到最佳水平时再进行高质量的育人工作和高品质的学习成长呢?

教育的功用,是在呵护生命的基础上,用理性和科学的教育教学管理助推个体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教育最人性的地方,也恰恰是呵护个体生命的健康成长。不管是从疾病预防角度,还是从发挥教育者最佳育人水平、营造最佳育人环境和学习成长环境,并体现对个体人性化呵护与理性化培育的角度,“不带病上课上学”才是最佳选择和最科学最理性的态

度。而与之对应的“对学生患病期间作业不做硬性要求”等举措,更是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理性以对。

当然,“不带病上课上学”以及“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一律不做硬性要求”等举措,必然会面临因病耽误课业如何弥补、落下的作业和学习内容如何完成等问题。从青少年成长角度分析,这样的要求也必然会面临学生为“规避学习负担”而出现“装病避学”现象。这就提醒我们,在实施教育理性纠偏的同时,更需要科学理性的辅助措施跟进,比如推行线上线下教学辅助手段,保证师生不因生病而影响课业学业同时缓解相关休息养护与教育教学、康复与学习成长之间的矛盾;比如推行患病对象补课制度和学业负担延伸消化制度,亦可以避免学生康复后陷入“一次性课补作业补课”和“对落下功课不管不问过度放纵”等情况。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调整手段,通过教师调课,集体和个体、小组帮扶康复学生等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生病对教育教学、学习成长的耽误影响。

## 让法治精神滋养青少年成长

□沈峰

12月4日,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实践基地暨金湾区人民检察院“小金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地在金湾区人民检察院正式揭牌。据悉,这是珠海首个面向青少年的法治宣传教育实践基地。(12月5日《珠江晚报》)

当前,青少年法治教育正在各地有序开展、稳步推进。但在一些地方,青少年法治教育流于形式,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总体上成效不高。其具体表现是:青少年法治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缺乏独立性,被归入道德教育,相关课程设计、教材选用、师资配备等主要依托道德教育;学时被压缩、占用的现象较为普遍;学习内容被简化为对法条的识记,实行填鸭式教学及应试考评,忽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的培养。

珠海建立首个青少年法治宣教实践基地,为广大青少年搭建展示演绎法治文化艺术教育的交流与学习平台,把推进法治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用法治文化的力量滋养青少年法治素养,深入开展青少年法治文化活动,集知识性、竞技性、趣味性于一体,符合当代青少年的兴趣和特点。比如在实践基地的模拟法庭,青少年可以进行法庭角色扮演、法庭辩论赛等法治实践活动,沉浸式体验庭审的庄严氛围,并“零距离”感受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特殊流程,从而增强法治观念。

进一步提升心理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让心理教师同其他教师一样在教育岗位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还需政府、学校、社会和心理教师的共同努力。比如在政府层面,适时出台相关政策,在职称评审、收入待遇、评优评奖中给予适当倾斜,改善心理教师的发展状态;在学校层面,对心理教师的工作绩效进行合理界定和分配,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在社会层面,破除“重学习成绩、轻心理健康”等偏差,形成支持学校心理教育的合力。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就是要在青少年时代对每一位社会成员开展系统的法治教育,发挥学校教育持续性、渐进性、专业性的优势,引导青少年树立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尊崇公序良俗,遵守法律法规,从而实现法治的育人功能。

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成效关系依法治国的走向、深度和持久性。青少年接受宪法等法治教育,学习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精神,有利于他们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信仰。一方面注重法律知识传授向注重法治精神培育转变。因为法治教育本质上是法治信仰的通识教育、养成教育,在法律知识普及的基础上,更要传递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另一方面,面向青少年开展法治教育,应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青少年学生是学习主体,法治教育要走出说教式、灌输式的教育方式,鼓励学生交流讨论和观察思考,从“身边事、眼前人”讲起,寓教于乐、晓理于行,让学生在参与和体验中产生思想的共鸣,进而成为行动的自觉。

## “中小学心理教师被边缘化”当引起警惕

□付彪

中小学心理教师,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在青少年心理问题防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这一群体在学校面临尴尬处境:“学校看重的就是成绩,我们这个学科又不考试,自然会被边缘化”“没出事时几乎隐形,出了事又会被推到风口浪尖”……(12月4日《半月谈》)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中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不足的情况比较突出。比如在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专职中小学心理教师不足10人;截至2022年10月,贵州省共有中小学心理教师10664人,其中专职教师814人,占比7.63%。专职不够兼职来凑,一名心理教师负责数千名学生的现象并不鲜见。尽管相关单位组织的培训数

量不少,但普遍缺乏针对性,对他们提升专业能力难有帮助,且许多培训和督导服务需要自费,制约着心理教师成长。

心理教师“千里挑一”,按说是学校的香饽饽,但事实恰恰相反。在部分中小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并未落到实处,心理教师、心理教育被边缘化的现象依然存在。有心理教师反映,年级领导称“班主任也能做心理健康教育,不需要专门开课”。多名心理教师表示“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很杂,但心理课没有考试,工作成果得不到体现”。同时,心理教师在职称和收入待遇等方面,较班主任和其他科任老师,明显处于劣势。

中小学心理教师、心理教育被边缘化的背后,折射的是我们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足。近

年来,中小学生对抑郁、焦虑、自伤等问题频发,日益引发社会关注。《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超过9500万,30%是18岁以下青少年,其中50%是在校学生。中小学生对心理问题多发频发,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不与心理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心理教师被边缘化有一定关系,对此当引起警惕。

毋庸置疑,孩子们急需得到专业的心理教育与引导,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健康工作,已成为一项拖不起的任务。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切实改变心理教师、心理教育被边缘化问题,把“软指标”变成“硬约束”。有必要为专职心理教师适度扩大编制,严格按照规定要求落实专(兼)职心理教师配备。压实学校主

体责任,增加心理教育的课时比重,并保障心理教师专职专干。建立心理教师定期培训和督导制度,提高心理教师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常态化开展心理教师集中教研活动。支持和鼓励建立心理教育名师工作室,不断提升教师专业水准。

提升心理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让心理教师同其他教师一样在教育岗位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还需政府、学校、社会和心理教师的共同努力。比如在政府层面,适时出台相关政策,在职称评审、收入待遇、评优评奖中给予适当倾斜,改善心理教师的发展状态;在学校层面,对心理教师的工作绩效进行合理界定和分配,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在社会层面,破除“重学习成绩、轻心理健康”等偏差,形成支持学校心理教育的合力。

## 该给二次元产品的产销立规矩了

□何勇海

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面向未成年人生产、销售软色情物品,已构成无底线生产和营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一些孩子长期接触这些不良产品,在潜移默化中,容易出现一些错误思想,产生不良行为甚至是违法犯罪。

然而让人惊异的是,《焦点访谈》记者在广东东莞调查发现,生产所谓“美少女”手办的厂家不止一两家。据某公司负责人介绍,至少有两家公司在设计、生产、销售“美少女”手办。报道还披露,近期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对多家电商平台进行巡查,发现有9个平台存在着向未成年人售卖不雅文具和手办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不良商品数达3万多个。可见,该手办已形成灰色产业,也暴露出监管漏洞,亟待修补。

相关部门应给二次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立规矩。近年来,源自动漫、游戏虚拟人物等形象的二次元产品在我国风起云涌、鱼龙混杂。一些不良厂商打擦边球或利用监管空白地带,模糊二次元和软色情的界限,大肆生产、销售软色情产品,引诱懵懂无知又充满好奇的孩子们。当软色情产品拥有二次元的身份,就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真正的色情产品有相关部门管控,还有父母过滤、学校筛选,而披着二次元外衣的手办呢?如今,到了对二次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立规矩之时。

除了立规矩,“扫黄打非”部门应将这类软色情产品纳入执法对象,并联合多部门,加强对相关生产的巡查检查,及时依法封禁,并重重处罚。色情文具玩具之所以层出不穷,主要还是生产者唯利是图,未成年人需要特殊保护,对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者就应重罚。市场、公安等部门还要加强对街边店铺和电商平台的监管,严厉打击违规售卖不良产品的行为。

在监管之外,学校应加强宣传教育,让学生认识到软色情物品的危害,家长要提升孩子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对孩子的不良行为及时予以纠偏,发现有商家销售色情文具玩具,应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生产者将动漫、游戏人物炮制成不良手办,会根据原版造型进行改动,这种改动涉嫌盗版侵权,因此,原动漫、游戏版权方也应就此维权。

## “作业打卡”是家校合作的误区

□吴维雄

11月30日,重庆市教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的通知》(下称《通知》),就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提出要求。《通知》中就家校合作提出具体要求,严禁给家长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12月1日《重庆日报》)

在部分学校,有些任课老师在布置家庭作业时都有让家长批改后在群里“打卡”的硬性要求。按理说,家长检查孩子的作业是家校合作的一部分,但是每天都要把孩子的作业拍照或视频打卡,这种极端的做法,不仅对家校合作毫无益处,还会加重家长负担,让家校合作步入误区。

家长有监督孩子作业完成情况的职责,以作业为媒与教师进行互动交流,是家校合作的内容之一。但是,各科作业都要家长批改及打卡,教师忙于统计家长打卡情况,家长忙于陪孩子写作业、改作业、拍照、录视频、打卡。为了让孩子有“面子”,为了获得点赞,家长们要绞尽脑汁拍出令人“眼睛一亮”的图片和视频。在焦头烂额的忙碌中,极易导致家校合作的着力点发生转移。

学生完成一定的家庭作业,本是一件常规的学习活动。但是,批改作业及作业打卡成为家长必须要承担的责任,是在用超常规的方式对待学生常规性的学习,此时家校双方可能就不太关注学生学习习惯

的养成及学习方法、学习能力、思维品质的培养,只关注图片及视频拍得美不美、奇特不奇特、有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上传。

以语文课中做手抄报为例,小学生的手抄报是稚嫩的、简单的,甚至在成年人看来是有缺陷或存在一定错误的,因为小学生对事物有基于童真童趣的独到见解,他们在手抄报里反映的是幼小心灵对世界的好奇与打量。但是,若将手抄报进行作业打卡,充满童真童趣的手抄报就很少了。为了让打卡的手抄报夺人眼球,很多手抄报都是家长的杰作。

“作业打卡”的时间段主要是晚上下班以后及周末、节假日,这段时间既是学生的放学时间,也是教师及

家长的下班时间。在下班时间内,家长本该处理家务、修养身心及自我学习,但繁重的作业批改及打卡任务,导致家长将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在孩子的作业上,不仅顾不上对孩子学习习惯、学习品质、兴趣爱好及综合素养的关注,还极大加重了家长的负担。教师用大量的业余时间统计打卡情况,用于关注学生成长的家校合作必然会大大减少。

利用微信等交流软件进行学生作业完成情况的家校合作,是信息社会的必然存在。但是,家校合作并非只有“作业”信息交流一个方面的内容,将作业批改及打卡作为家校合作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是对家校合作的误读,这种情况必须要彻底改变。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

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可以。

家风